

大炮學人

傅斯年傳奇

● 王培堯

出身書香世宦之家

傅斯年（一八九六—一九五〇），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人物，橫跨學術界與政界，新文化運動的巨人，「五四」學生運動愛國遊行的總指揮，抗戰期間呼籲「書生報國」，怒斥漢奸文人，力主倒孔（祥熙）驅宋（子文），名重一時。在學術方面創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發掘及主持殷墟考古，把西方科學知識引進中國考古領域。同時，也是教育改革的推動者和實踐者，曾代理北京大學校長、擔任臺灣大學校長，任內倡導學術紮根及自由傳統，使臺大成為北大校風的延續。

傅斯年，字孟真，山東聊城人，一八九六年三月十六日生於聊城縣的北城，出身儒學世家，其先祖為清王朝的第一位狀

元，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尚書。其後，他的家族科場連捷，封官拜爵者多達百餘人。其祖父為一拔貢，父傅旭安鄉試中舉，但未入仕途，為了生計，於傅斯年三歲時攜家至山東東平縣任龍山書院山長（校長），一九〇四年病逝，當時傅斯年才九歲，其弟傅斯岩僅七個月大，靠其母由斷壁殘垣上拆些磚瓦來變現維生。

對傅斯年影響最大的人，是他的祖父傅淦，傅淦曾飽讀經史，少負才名，但絕意仕途，傅斯年四歲起和祖父同睡一榻，黎明即起，由祖父口授歷史故事，四年內授完二十四史，到十歲時，已讀完十三經。十三歲時，得到父親友人侯延棟的幫助，進入天津府立第一中學，五年後畢業，以極優異的成績考進北京大學預科第二部。一九一三年秋升入北大本科中國文學

系，當時北大盛行章太炎學派，傅斯年敬佩章太炎的人格和學問，加之他根基深厚，聰敏好學，迅即成為劉師培、黃侃、陳漢章三位國學大師的高足，希望他繼承古文經學派的衣鉢，不料留美歸來的胡適也到北大執教，使他的學業和思想起了根本上的變化。

問學胡適走出舊學

胡適講授的「中國哲學史」，內容更新，一改由伏羲講起的慣例，就讀哲學系與他同一寢室的顧頡剛邀他去旁聽，他認真的去聽了幾堂課，被胡適的思想和研究方法所吸引，毅然走出舊文化的藩籬，躋身倡導新文化的行列，他在治學常說的一句話：「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就是那時悟出來的。

一九一八年春，他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文學革新申議」一文，是學生發表文章的第一人。此後，他全心投入新文化運動，陸續發表了五十多篇論文，都十多萬言，他的興趣廣泛，視野遼闊，舉凡各種熱門話題，如文化、文學、哲學、倫理、邏輯、家庭、人生、學術以及朝鮮獨立、俄國革命、整理國故、戲劇改良……都曾涉足，並且不乏新鮮精闢的見解。

組新潮社鼓吹新學

為推動新文化運動，傅斯年不但寫文章，還糾集羅家倫、顧頡剛、徐彥之等同學，組織「新潮社」，創辦「新潮」雜誌，他被推為主編。一九一九年一月，新潮雜誌創刊號出刊，他發表「新潮發刊旨趣書」，說明新潮雜誌的四項任務：一是喚起國人對於本國學術之自覺心，使思想僵化的中國「浴於世界文化之流」；二是對中國社會進行啟蒙教育、除卻惡習，改變國民的思想狀況；三是鼓勵學術興趣，以培養人們的事業心，提高人們辨別是非的能力；四是致力於提高學生思想素質，幫助他們擺脫封建文化、道德的影響，「去遺傳的科舉思想，進於現世的科學思想，

去主觀的武斷思想，進於客觀的懷疑思想；為未來社會之人，不為現在社會之人；造成戰勝社會之人格，不為社會戰勝之人格。」這些主張，也集中地反映了傅斯年對新文化運動的理解和思想追求。傅斯年主編新潮，一直把「批判精神」、「科學主義」及「革新文詞」作為選稿的標準。當時相繼加入新潮陣容的，除傅、羅、徐三人，還有楊振聲、汪敬熙、譚平山、俞平伯、潘家洵、毛子水、張蔭年、何思源、朱自清、馮友蘭、周作人等人。

「五四」遊行的總指揮

一九一九年一月巴黎和會，英、法、日等國公然把德國在山東半島的特權讓給日本，引起大學生的愛國自覺，五月三日晚，傅斯年出席北大學生大會，被推為北平十三所大專學校的學生代表之一，五月四日上午九時，三千多名大學生齊集天安門廣場遊行示威，傅斯年被推為總指揮，扛著大旗走在隊伍前面。走至美國使館前遭軍警阻止，群情激昂，傅斯年勸阻無效，他怕出事，舉旗率領大家走向趙家樓，找曹汝霖理論，此後即發生痛打外長章宗祥及火燒趙家樓，使遊行示威達到最高潮

。翌日，學生再度集會示威，傅斯年主張慎重，遭山西籍學生胡霽靈毆打，眼鏡都被打破，使他熱情頓減，退出示威遊行，但他已在學生運動史上，寫下輝煌的一頁。

這時，胡適的指導對他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胡適對他說：「罷工罷市是很笨拙的消極武器，很難使用，很難持久。」「排隊遊街，示威打倒英、日強盜，算不得救國事業」，「國家的紛擾，外間的刺激，只應該增加你求學的熱心與興趣」。

傅斯年從此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努力的讀書生活，是我對付那些複雜的問題唯一而有效果的法子。」於是，一九一九年底，傅斯年交代完「新潮」事務，踏出出國留學的旅途。

留歐治學脫胎換骨

一九二〇年春，甫自北大畢業的傅斯年，踏上留學之路，他到了英國倫敦，進入倫敦大學研究院深造，他從史培曼（Spearman）教授研究實驗心理學，從生理學以通心理學而進於哲學。那時一般人對自然科學非常傾倒，除想從自然科學得到可靠的知識而外，還想從那裏面得到科學方法訓練，認為這種訓練在某種科學以內

固然可以應用，就是換了方向而來治另外一種學問，也還可以應用。傅斯年留英期間，除研究實驗心理學以外，還研究物理學、化學及高深的數學。他對於數學的興趣比較濃厚，因為他在國內的時候就喜歡看邏輯的書，研究皮爾生 (Karl Pearson) 的科學規律 (Grammar of Science) 和或然律 (Law of Probability)。後來像金斯 (T.M. Keynes) 所著的「或然律研究」 (Treatise on Probability) 一類的書，他都是欣賞的。

一九二三年傅斯年由英倫轉歐陸進入德國柏林大學哲學研究院研究。當時德國學術界有兩種風氣最盛，一是近代物理學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勃朗克的量子論，都是震動一時的學說；一是德國一向著名的語言文字比較考據學。他受此風氣以及在柏林的朋友，如陳寅恪、俞大維的影響，在柏林既聽相對論，又聽比較語言學。他有了許多科學的方法和理論及其極為豐富的中國歷史及語文的知識，由此便可另闢新天地。這便是他後來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的由來。

傅斯年留歐七年，於一九二六年回國，已脫去血氣方剛的形象，而成為學識淵博的青年學人。回國不久，被聘為廣州國

立中山大學文科學長兼歷史系主任，他延聘了多位著名學人到中山大學任教，他自授「尚書」、「陶詩」、「古代文學史」及「心理學」，為中山大學文學院奠下良好的基礎。第二年，他在中山大學創設國內第一個語言歷史研究所，招考研究生。

用科學創辦史語所

去。他真是克難英雄中的第一把手。」史語之所以能碩果累累，除去傅斯年的運籌擊劃之功，還在於他始終把發現和網羅、培養和愛惜、理解和尊重人才放在重要的位置。他常說：「一分人才一分成績，半分人才半分成績」，沒人才一切都談不上。

一九二七年，他奉派籌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任所長，乃辭去中山大學教職，他雄心勃勃，提出龐大的發展計劃和學術研究目標，網羅一流學者專家，在他的領導下，廣泛搜集，用「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精神，運用科學方法整理材料，取得了累累碩果，如現代語言學的研究和發展，人類學科的建设，安陽殷墟遺址的考古發掘等，都充分顯出他超人的學術遠見和卓越的領導才能。著名考古學家李濟以自己的親身體會說：「無論是辦研究所或大學，他總是像一個設計的總建築師經營一個偉大的建築一樣，有一套完整的藍圖，並且與他的工程師充分地合作，按部就班，一段一段地完成他的計劃。困難總是有的，並且常常地遭遇到很大的困難，但他總有法子渡過

一九二八年，他在史語所年度報告書中說：「中央研究院設置之意義，本為發達近代科學，非為提倡所謂固有學術。故如以歷史語言之學承固有之遺訓，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觀念，以成與各自然科學同列之事業，即不應於中央研究院中設置歷史語言研究所，使之與天文、地質、物質、化學等同論。今者決意設置，正以自然科學看待歷史語言之學。並且要以科學的方法治歷史語言之學。」他在報告中寫得很明白：「此雖舊域；其命維新。材料與時增加，工具與時擴充，觀點與時推進，近代在歐洲之歷史語言學，其受自然科學之刺激與補助，昭然若揭。以我國此項材料之富，歐人為之羨慕無似者，果能改從新路，將來發展，正有未艾。故當確定旨趣，以為祈嚮，以為工作之徑，以吸收同好之人。此項旨趣，約而言之，即擴充工

具，以工具之使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問題之解決；並以問題之解決，引出新問題，更要求材料與工具之擴充；如是伸張，乃向科學成就之路」。他不贊成整理「國故」，研究「國學」或「中國學」等字樣，用老法子囫圇吞棗讀古書。反對把些傳說的或自造的「仁、義、禮、智」和其他主觀事物，同歷史學和語言學混在一起。他主張的是要能從中國採集的原料中，製造出歷史語言科學，並特別強調運用新工具、新材料，研究新問題。

駁斥漢奸聲色俱厲

正當傅斯年努力創建科學的東方學正統時，日本帝國主義於一九三一年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侵我東北，傅斯年聞訊義憤填膺，在北大召開的時事討論會上，他急切的提出書生應如何報國的問題，成為全國討論思考的中心。會後他又聯絡方壯猷、徐中舒、蕭一山、蔣廷黻等人撰寫東北地方史，以駁斥日本帝國主義所宣揚的「滿蒙在歷史上非支那領土」的謬論。他奮筆疾書，晝夜不息，很快就完成「東北史綱」第一部。他旁徵博引，以無可辯駁的史實證明東北從來就是中國領土。

一九三二年一月，國聯組織以李頓為首的五人調查團，對「九一八」事變，東北歸屬等問題進行調查。傅斯年讓李濟把《東北史綱》的主要部分譯成英文，交給調查團。「九一八」事變後，東北國土大部分淪入敵手，他痛心疾首，一九三二年春他和胡適、丁文江、蔣廷黻籌創辦「獨立評論」，呼籲國人奮起，準備投身戰爭。他在「獨立評論」上發表「日寇與熱河」、「九一八，一年了」、「中國人做人的機會到了」、「中日親善」等廿多篇文章，揭露日寇罪惡及親日漢奸的醜態，宣揚抗日救國，反對妥協投降，表現出知識分子的愛國熱誠。

一九三五年十月，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到北平，與廿九軍軍長宋哲元的幕僚蕭振瀛勾搭，策劃華北五省自治，蕭某出面邀請著名教育界人士至懷仁堂談話，要求知識界不要再發表抗日言論，宣揚華北自治。當時國軍已撤離河北，日本特務及浪人幾乎公開橫行，以恐怖暗殺對付愛國志士。在座人士都噤若寒蟬，獨有傅斯年拍案而起，表示堅決抗日，反對華北自治。他警告說：「所謂華北自治，實質上是強奸民意，分裂祖國；任何背叛民族，

分裂祖國的行為，必將遭到唾棄。」他的話，義正辭嚴，聲震瓦舍。與會者議論紛紛，贊同傅斯年的意見。蕭振瀛當眾出醜，狼狽不堪。此事在北平各界廣為流傳，他伸張了正義，鼓舞了人心。

傅斯年於一九三四年與俞大維的妹妹俞大綵結婚，婚後，孩子還沒出世，他即取名為傅仁軌，希望兒子效法唐朝時領兵在朝鮮打敗日本的劉仁軌。傅斯年和胡適亦師亦友，但是當國民政府與日本簽訂「塘沽協定」時，胡適在「獨立評論」撰文表示贊同，傅斯年隨即退出獨立評論，並與胡適斷絕關係。

倒孔驅宋成了大炮

傅斯年認為抗日是頭等大事，但要取得勝利，必須要先做好內部，基於此，他的態度由于政改為參政，接受了國民參政員的職務，在此一職務上，他做了兩件轟動全國的大事，就是罷退孔祥熙，轟走宋子文，而成為有名的「傅大炮」。一九三八年初，孔祥熙任行政院長兼財政部長，傅斯年認為孔才不勝任，上書委員長蔣中正要求撤換，如石沉大海。他不甘心，一九三八年七月，他把一封長信親手交給蔣

，信中列舉，孔祥熙種種貪瀆劣跡，言辭懇切，理由充分，但未能改變蔣的主意。他感到失望，但仍堅持「去孔」，他把上書改成質詢，在參政會上猛轟孔祥熙，並把孔的黑材料寫成議案，聯合其他參政員共同簽署成案，轟動全國。蔣中正鑒於國內外輿論壓力，免去孔祥熙的一切實際職務。由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長。宋上臺不久，以解決抗戰時期財政困難為名，制定了「黃金獻金條例」。傅斯年不知就理，撰文擁護。但他很快發現，宋子文「獻金」措施是損人利己，他深表憤慨。宋子文大權獨攬，專橫跋扈，較孔祥熙有過之而無不及。傅斯年疾呼：「熬過了孔祥熙，又來了這樣的宋子文。」他以抑制不住的憤怒寫了「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對其腐敗行為給予猛烈抨擊，他說：「要

做的事多極了，而第一件便是請走宋子文。」並且提出「徹底肅清孔、宋二家侵蝕國家的勢力」。此文發表後，輿論嘩然，「倒宋」浪潮就此掀起。十四天後，即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宋子文被迫辭去了行政院長職務。

抗戰期間，傅斯年帶著史語所的上千箱書籍、檔案、儀器、標本，數次遷徙，

由南京至長沙、昆明、桂林、四川，顛簸流離、輾轉大半個中國。每次遷徙，他都親自選擇地點，安排運輸，落實押運，其中的艱難，難以盡言。在四川李莊六年，物資供應困難，肉食蔬菜自不必說，吃飽，有時也成為問題。為此，傅斯年常常和地方政府官員交涉，有時不惜打躬作揖，請求支助。生活最困難時，傅斯年賣掉自己珍貴的藏書，救濟那些子女多、生活特別困難的研究人員。

嚴耕望憶及當年，感慨地說：我之所以能取得成就，是因為傅斯年有遠見，創造了史語所這樣圖書豐富、工作自由、生活安定的優良環境，讓每個有志之士都能隨心所欲地研究。否則，浮沉在那樣紛亂不定的社會中，即使能夠覓得一枝棲，要想在學術上取得一點成就，也是不可能的，這可以說是史語所同仁的共識。早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傅斯年就明確提出，要通過學術研究，喚起國民覺悟，進而實現救國理想。他的學術實踐，他的識才、愛才、育才，實際上也是愛國意識的表現。

抗戰勝利後，蔣中正邀傅斯年任國民政府委員，他力辭不就，蔣請陳布雷勸說，仍然無效。這時，他對國民政府失望，

對叛亂而掀起內戰的共產黨也無好感。一九四四年九月，國民參政會選派無黨無派的王雲五、冷遹、胡霖、傅斯年、陶孟和五人訪問延安。在會見毛澤東時，毛大讚傅斯年在新文化運動中的表現，他卻說：「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毛澤東聽後笑了笑。臨別時，毛澤東寫給他一張條幅：「不將寸土分諸子，劉項原來是匹夫」，這是毛澤東對他前言的回答。

代北大校長解難題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初期，中央擬任傅斯年為北大校長，他堅辭，並推舉胡適出任，當時胡適人在美國，囑由他代理校長。師長有言，他只好勉乎其難，翌年九月，胡適回國到任，他交卸了代理職務。代理校務期間，他解決了兩大困難：第一個是復員問題。抗戰期間北平天津幾所有名的大學，南遷到大後方，成立聯合大學，繼續上課。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遷到後方後，在雲南昆明成立西南聯合大學。抗戰勝利之後，西南聯大解散，要辦理復員工作，各大學各自遷回原校。聯合時固不容易，分離時更不簡單，加以

數千員生和龐大校產的長途遷移，其困難自可想見，他為此費了不少心思。另一個困難處理偽北大教職員問題。抗戰開始後，平津淪陷期間，敵偽在北平的北大舊址另設立了一個偽北大；抗戰勝利後，偽北大尚有員生數千人，無法安置。教育部乃在北大設立補習班，收容偽北大學生，並徵調一批偽北大教職員暫時維持課業，徐謀解決的辦法。但這批偽教職員，組成團體，到處請願，要求北大復員後繼續留用。

傅斯年為了保持北大的清潔，維護北大的光榮傳統，於是年十月、十二月在重慶先後發表聲明：北京大學決不錄用偽北大的教職員。並且一再強調：「專科以上學校，必須要在禮、義、廉、恥四字上，做一個不折不扣的榜樣，給學生們、下一代的青年們看看。」「學校是陶冶培植後一代青年的地方，必須要能首先是非、辨忠奸。否則下一代的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負教育責任的人，豈不都成了國家的罪人？」他的兩次聲明，在北平引起了很大的騷動。偽教職員以罷課為要挾，並向北平行轅當局請願。當時若干中央要員，對偽校教職員往往濫示同情，更增加了他們的氣燄，鬧得烏煙瘴氣。但憑他的勇氣和毅

力，加以政府的堅決支持，終能使北大在北平順利復課。傅斯年交卸北大代校長職務後，於一九四七年九月攜妻赴美治病。次年剿共局勢逆轉，大陸全面陷共。一九四九年一月，國民政府任命傅斯年為臺灣大學校長，這時臺灣處在風雨飄搖之中，他懷於忠臣不事二主及忠孝節義的古訓，決定返回臺灣，他在離美前寫給臺大中文系教授黃得時的中堂有「歸骨於田橫之島」一句，是他心性的最佳寫照。

接長臺大貢獻卓越

他任臺大校長將近兩年，為臺大引進北大自由的學風，使臺大成為中外知名的高等學府。他對臺大重要的貢獻有三：第一、興建校舍，擴充設備。臺大前身為日據時代的「臺北帝大」，圖書儀器設備不敷應用。臺灣光復後，學生人數激增，教室及學生宿舍均極感不敷分配。他接長後，從百般艱苦中購置圖書儀器，興建大批校舍，解決了教學上極端嚴重的問題。

第二、成立教員聘任資格審查委員會。傅是個讀書人，也最敬愛讀書人，對於聘請教員非常慎重嚴格。對於好的教授一定想盡法子聘請其來校教課，經資格審查

會通過，給予相當的名義；資格不合的，不管是什麼有力人物，想在臺大求一教席是絕不可能的；由此樹立了教員聘任制度，也提高了教員身分。在臺大的兩年當中，他聘請了不少的名教授也得罪了不少人。

第三、釐訂嚴格考試制度。他一向對於學生的學業極為重視，而對於招收學生之認真可說是無以復加。他接長臺大的第三件大事，便是首創考試印題「入闈」制度。那時候的「闈場」只是借用臺大圖書館一隅之地，封得嚴嚴的，既無紗窗，更談不上冷氣設備，在七月溽暑的天氣，實在有些不好受。窗外崗警密佈，如臨大敵。今日大專新生入學以及各種考試入闈印題之成功，不知減少多少無謂的人情麻煩，不能不歸功於當時的創始者。他對於學生平時的功課也很注意，考試制度之嚴格，為他校所罕見；考試要編號，集中考試，無形中提高了學生的程度。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廿日下午，傅斯年列席臺灣省議會第五次會議，為學校經費問題接受議員質詢，有位所謂黨外議員，出言不遜，氣得他發抖，在走下講臺時，突發腦溢血，於當晚十一時辭世，年僅五十歲。